

联合国 2030 议程：进展、 挑战和后续路径^{*}

□ 李 佳 贡 森

〔提 要〕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引领，是人类社会面向 2030 的全球发展理想和治理共识。实施十年来，统筹人地关系的发展共识不断凝聚，人类在减贫、公共卫生、教育、能源等领域取得积极进展，数据收集及监测体系得以建立并不断完善。与此同时，2030 议程也面临目标与执行的落差、南北方国家认知与能力的差异、地缘政治和外部环境冲击等挑战。随着 2030 议程进入末期，各方就“后 2030 议程”展开布局和博弈，呈现整体延续型、全球重构型、“区域多元型”之间的路径差异。“后 2030 议程”不仅是各方全球治理博弈的重点，更关涉全球的公平善治和长远发展，关涉人类社会和国际合作的未来走向。作为负责任大国和经济全球化受益者，中国是 2030 议程的重要贡献者，也要积极参与并引领“后 2030 议程”的塑造。

〔关 键 词〕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后 2030 议程、全球发展、全球治理

〔作者简介〕李佳，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浙江（浙江大学）

国际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贡森，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浙江大学）

国际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中图分类号〕D8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25）5 期 0041-24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非传统安全风险与全球治理”（项目批准号：24&ZD2961）的阶段性成果。感谢浙江大学国际组织与国际交流专业硕士生孙一昊在本文资料和文献整理中做出的大量工作。

21 世纪前 30 年,联合国以千年发展目标(MDGs)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两个前后相继、各持续 15 年的议程引领全球发展。2015 年 MDGs 到期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30 议程)的 17 项 SDGs 为人类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新图景,成为全球发展合作的行动指南。十年来,联合国和各成员国积极推动落实 2030 议程,取得积极进展,但也存在多方面困难。联合国近年多次报告表达了无法按期实现多个指标的担忧,特别是在粮食体系、能源供应、数字化转型、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气候和生物多样性等领域。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围绕如何加快落实 2030 议程以及如何应对当前结构性挑战,已开始对 2030 议程到期后的全球议程,即“后 2030 议程”的探讨。2030 议程的落实与“后 2030 议程”的设计,均涉及全球公平善治和人类和平发展的重大议题,是国际关系与全球治理的重大现实和前沿议题,也关涉我国如何更好推动自身发展与全球议程对接,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一、2030 议程的实施进展

2015 年 9 月在联合国大会第 70 届会议上通过的 2030 议程是 2015—2030 年新的全球发展路线图,包括 17 项 SDGs 和 169 项具体目标,旨在指导此后 15 年的全球发展事业。有别于 MDGs,2030 议程是一套融合人类、地球、繁荣三维发展目标的框架体系。在实施中,这套框架体系逐步凝聚广泛的理念共识,引领国际社会在全球公共卫生、教育、能源、减贫等可持续发展领域取得积极进展,议程指标相关的数据统计和评估监测机制也得以建立并不断完善和创新。

(一) 2030 议程目标原则得到各国高度认可

2030 议程的出台,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世界发展转型达成了共识,即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必须向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1]在 2030 议程推动下,可

[1] 关婷、薛澜:《世界各国是如何执行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 年第 1 期,第 11-20 页。

持续发展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主流话语和各国政策的重要指导原则。

在战略框架上，2030 议程强调经济、环境与社会三位一体的平衡发展，要求传统工业化模式向资源节约、绿色低碳、普惠共享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型。这一框架在维度上丰富和拓展了 MDGs，纳入与经济和环境密切相关的一系列议题，从而实现从单一减贫与社会发展向综合性可持续发展的提升。

在核心愿景上，“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Leave No One Behind）的理念持续深化，共同致力于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抵制歧视和排斥，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2023 年 9 月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峰会重申了这一理念的重要性，与会各国首脑普遍将扩大社会保障与普及教育置于优先议程，并转化为各国发展政策的重要部分。

2030 议程的落实主要依靠各国自愿行动和评估机制。绝大多数国家对 2030 议程作出了较高程度的政治承诺，将 SDGs 融入国家发展方案和政策，建立由高层官员牵头的 SDGs 协调机制，并通过自愿国别评估和自愿地方评估报告各自的国家计划和优先事项。自 2015 年以来，大多数国家提交了两份及以上的自愿国别评估，另有 39 个国家承诺 2025 年提交自愿评估报告，目前仅海地、缅甸和美国 3 个国家没有参加评估。^[1]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参与自愿地方评估，报告 SDGs 在一国省级的实施情况。^[2]截至 2025 年 4 月，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已收录来自 43 个国家的 249 份自愿地方评估报告。^[3]

（二）可持续发展诸多领域取得显著进展

在自愿评估和由高层官员牵头的跨部门协调机制推动下，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基本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可及性方面取得了可量化的进展，尤其在减贫、

[1]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A Decade After Their Adoption at the UN, the World Remains Highly Committed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June 24, 2025, <https://www.unsdsn.org/news/a-decade-after-their-adoption-at-the-un-the-world-remains-highly-committed-to-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2] *Ibid.*

[3] Jeffrey D. Sachs et 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2025: Financ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2030 and Mid-Century,” July 2025, <https://s3.amazonaws.com/sustainabledevelopment-report/2025/sustainable-development-report-2025.pdf>.

公共卫生、教育、能源等领域。^[1]

在减贫领域，极端贫困和在职贫困问题得到改善。尽管至 2022 年全球依然有 9% 的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极端贫困率受疫情影响出现 20 年来首次上升，^[2] 但相比 2015 年的 10.5% 仍有下降；按照 2017 年购买力平价计算，2024 年每天生活费低于 2.15 美元的就业人口比例为 6.9%，低于 2015 年的 8.4%。^[3] 在公共卫生领域，许多关键指标显著向好。2015—2023 年，全球孕产妇死亡率从 228/10 万降至 197/10 万，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从 43‰降至 37‰，艾滋病新发感染率从 0.25‰降至 2023 年的 0.17‰；^[4] 截至 2024 年 12 月，非洲疟疾死亡率较 2015 年下降了 16%。^[5] 在教育领域，全球各级入学率和学业完成率有所提高，完成高中学业的年轻人比例从 2015 年的 53% 增加到 2024 年的 60%；全球识字率、阅读和写作技能有所提高，性别间差距也在缩小。^[6] 在可持续能源和数字基础设施领域，2015—2023 年，全球通电率从 87% 上升到 92%，清洁烹饪燃料获得率提高了 16%；2024 年全球人口的互联网使用率提升至 68%，比 2015 年提高约 28%，移动宽带接入率达到 92%。

（三）数据统计和监测机制不断完善

在推动 2030 议程实施的过程中，由于议程涵盖目标广、领域交叉强，各国实施能力与进展不均衡，加之全球数据基础有明显缺口、统计标准不一，跨国别跨区域的比较和有效评估存在困难，国际社会对推动循证决策与提升政策问责的需求日益迫切。因此，数据统计和监测被视为评估和推动议程实

[1] 如无特别标注，本节数据均来自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Progress toward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pril 29, 2025, <https://unstats.un.org/sdgs/files/report/2025/secretary-general-sdg-report-2025--EN.pdf>.

[2] United Nation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25,” July 14, 2025, <https://unstats.un.org/sdgs/report/2025/>.

[3] United Nations, “World Social Report 2024,” October 2024, <https://desapublications.un.org/publications/world-social-report-2024-0>.

[4] “HIV Incidence per 1,000 Individuals, by Age, World,” Our World in Data, <https://ourworldindata.org/grapher/incidence-of-hiv-by-age>.

[5] WHO, “World Malaria Report 2024,” December 11, 2024, <https://who.int/teams/global-malaria-programme/reports/world-malaria-report-2024>.

[6] United Nation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25.”

施的关键支撑。联合国不断强化数据搜集和统计，探索监测机制创新以提高治理效能。

一是根据现实动态调整和完善指标体系。全球指标框架是联合国大会为在全球层面监测 2030 议程而采纳的统计指标体系，覆盖 SDGs 的 17 个目标与 169 个子目标。联合国于 2020 年和 2025 年对此开展了两次全面审议。2020 年，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依据 SDGs 指标跨机构专家组（IAEG-SDGs）的技术审议与建议，淘汰了可比性不足、方法停滞的过程性或“软性指标”，增补了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移民人数、教育普及率、女性贫血率等可量化、数据成熟的指标。^[1]2025 年第二次审议在保持总量稳定的前提下对指标框架进行了小幅调整，将最低膳食多样性、旅游业就业人数、卫生用品可及性指数、青少年及成人识字率等纳入或修订为新的全球指标。^[2]经过两次完善，全球指标框架中的专属指标数量最终确定为 234 个，体现了联合国在强化可测性的同时对指标稳定性与报告数据可及性的权衡。

二是建立统计与监测体系，提升数据可得性与可比性。越来越多的国家按年度更新核心指标数据，数据覆盖度和可靠性有所提高；同时，SDGs 指标跨机构专家组通过设定绩效阈值（即绩效指标范围，用于衡量目标完成情况）和极值处理（作为一种统计学方法，用于分析和预测极端事件的概率）来提升跨国数据的可比性，^[3]为循证决策和问责提供了可靠基础。

三是创新应用数字技术，提升统计和监测科学性。世界各国和联合国统计司、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等利用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技术手段，监测 SDGs 并辅助决策。例如，SDGs 指标跨机构专家组已识别出地理空间数据能够直接支持或发挥补充作用的 20 余项指

[1] IAEG-SDGs, “2020 Comprehensive Review Proposals Submitted to the 51st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al Commission for Its Consideration,” <https://unstats.un.org/sdgs/iaeg-sdgs/2020-comprev/UNSC-proposal/>.

[2] “2025 Comprehensive Review Process and Result,” February 19, 2025, https://unstats.un.org/sdgs/files/meetings/iaeg-sdgs-side-event-UNSC56/2.1-2025_Comprehensive_Review_UNSD.pdf.

[3] Jeffrey D. Sachs et 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2025: Financ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2030 and Mid-Century.”

标；^[1] 国际电信联盟等机构指出，数字技术能够对约 70% 的具体目标产生直接促进作用。^[2] 同时，数字工具在自愿国别评估和地方评估中也得到使用。例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DSN）和地理信息企业合作开发了数字和数据驱动的报告模板，被阿联酋、夏威夷等多地在编制进展报告时采用。^[3]

二、2030 议程实施中面临的挑战

尽管国际社会在 2030 议程上取得了积极进展，但其整体实施进程显著滞后于预期，在实施过程中面临多重挑战，既包括目标设定、执行机制等技术性问题，也涵盖南北合作、外部环境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层次困境。

（一）宏大目标与具体执行的落差

2030 议程建构了一套颇具雄心和引领性的目标体系，其初衷在于以全面且普遍适用的目标体系重塑全球发展路径。然而，这一宏大的规范性共识在转化为具体实践时遭遇了显著的“执行赤字”。实际上，此前 MDGs 的推进就面临目标设定过于宏大且理想化，而各国国情与能力差异巨大的问题。^[4]

第一，部分国家尚处在内生能力建设过程中，将全球议程转化为本土政策与行动时面临挑战。2030 议程强调各国自主性，意图以更强的政治承诺、更完善的实施机制逐步化解结构性难题，但忽视了国家间的实力和能力差异，成为其进度整体滞后的内在原因。同时，SDGs 原则上以目标为导向，每个国

[1] Maryam Rabiee, “How Are Countries and Cities Using Geospatial Data to Monitor Their SDGs?,” December 22, 2023, <https://blogs.worldbank.org/en/opendata/how-are-countries-and-cities-using-geospatial-data-monitor-their-sdgs>.

[2] 《国际电联：数字技术助力推进 70% 可持续发展目标》，2023 年 10 月 31 日，<https://www.cace.org.cn/News/NContent?key=366e505065641ced4fd24c4651d46f3a>。

[3] Maryam Rabiee, “How Are Countries and Cities Using Geospatial Data to Monitor Their SDGs?”

[4] 孙新章：《中国参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战略思考》，《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 年第 1 期，第 1-7 页。

家可根据自身国情选择最佳的实施方式。这种“通过目标进行治理”的方法对全球政策话语和国际组织具有引导效应，增强了政治传播性，比 MDGs 更易遵循，却不一定带来更好的成果。^[1] 实践中可能出现过度依赖技术指标、“以指标代替治理”的倾向。^[2]

第二，议程推进过程缺乏聚焦与优先序。SDGs 采用一种目标与指标相互作用的系统整合方式，表面上提高了决策理性化水平，但在政策推进中容易迷失于复杂的耦合关系，缺乏清晰的优先方向。^[3] 从执行情况看，只有约 11% 的国家开展了 SDGs 政策相容性评估，^[4] 政策之间的协同管理能力偏弱、协同效应不足。同时，资源配置出现严重倾斜，约有 73% 的资金集中于能源、基础设施等易于量化和短期见效的领域，而在诸如消除贫困、生态保护等需要长期投入的领域，资金到位率却不足 20%。^[5]

第三，一些国家和指标的统计数据存在缺失。尽管十年来 SDGs 的数据收集和统计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但 2025 年仍有安提瓜和巴布达、多米尼克、赤道几内亚等 26 国因数据缺失率超过 20% 被排除在外。^[6] 从指标范畴看，粮食损失与浪费(SDG2)、全球卫生风险防范(SDG3)、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SDG5)、气候适应(SDG13)以及可持续发展政策协调(SDG17)等领域存在数据盲区，^[7] 对 SDGs 的推进效率造成严重负面影响。

第四，制度设计偏重共识达成而忽视政治资源配置。有学者指出，2030

[1] Mark Elder and Susanne Grünewald, “Insights from Agenda 21 for Enhanc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DGs and Shaping the Post-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 *Earth System Governance*, Vol.25, 2025, p.25.

[2] Ankit Kumar et al., “Development Beyond 2030: More Collaboration, Less Competiti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Review*, Vol.46, No.2, 2024, pp.227-242.

[3] Basil Bornemann and Sabine Weiland, “The UN 2030 Agenda and the Quest for Policy Integration: A Literature Review,”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Vol.9, No.1, 2021, pp.96-107.

[4] Jeffrey D. Sachs et 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2024: The SDGs and the UN Summit of the Future,” <https://files.unsds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report-2024.pdf>.

[5]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4,” <https://digitallibrary.un.org/record/4052095?v=pdf>.

[6] Jeffrey D. Sachs et 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2025: Financ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2030 and Mid-Century.”

[7] *Ibid.*

议程在规范层面强调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与多层级治理，在实践层面呈现协商主义和共识主义取向，较少触及资源再分配与权力再配置等争议性议题，^[1]致使许多关键目标停留在“善意动员”的层面。^[2]此外，统筹与问责机制偏软，各国在承诺履行、报告进展、效果评估等方面缺乏有效跟踪，政治承诺难以转化为执行和落实，部分承诺甚至流于形式。有学者指出，联合国每年召开的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HLPF）会期较短，偏重政治表态而缺乏实质行动，难以承担跨层级协调的任务；自愿国别评估和自愿地区评估虽能提升政府绩效的透明度与一定程度的“向下问责”，但约束力与可执行性依然不足。^[3]

（二）南北方国家认知与能力的差异

2030 议程的合作框架是一个多层级、多利益攸关方共同参与的全球伙伴关系。SDG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既是一个独立目标，也是实现其他目标的催化剂。伙伴关系强调国际社会的集体行动，但南北方国家在责任认知取向和国家内生能力两方面存在结构性分歧和失衡。

第一，南北方国家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认知上存在显著分歧，且这种分歧在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的优先目标选择上被进一步放大。对于责任的分担，北方国家偏重“共同”，强调当前行动的普遍性，并试图将新兴经济体拉入对等责任的框架，以维护自身利益和全球领导力；南方国家偏重“有区别”，强调历史正义和现实可行性，要求获得公平的发展权和必要的政策空间，并寻求北方国家兑现其资金和技术方面的承诺。同时，各国发展程度

[1] Guillermo Santander-Campo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2030 Agenda: An Unbalanced Relationship?,” *Iberoameric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10, No.2, 2021, pp.108-129.

[2] Guillermo Santander-Campos, “An Analysis of the 2030 Agenda from Political Theory: Opportunities as a Transformative Tool,” *Política y Sociedad*, Vol.60, No.1, 2023, p.1.

[3] Thiago Gehre Galvão and Henrique Zeferino de Menezes, “Editorial – Global Politics, the 2030 Agenda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 *Journal of Global Studies*, Vol.21, 2020; Mark Elder and Susanne Grünewald, “Insights from Agenda 21 for Enhanc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DGs and Shaping the Post-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

的差异导致对优先目标的认知不同。在联合国基于 169 项具体目标和 232 项指标综合计算得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数 (SDG Index) 排名前 20 的国家中，有 19 个位于欧洲，芬兰、瑞典、丹麦三个北欧国家位居前三。^[1] 这些国家的社会民生类指标进展靠前，在气候行动 (SDG13) 与生物多样性 (SDG14 和 15) 上则面临挑战，因而更重视环境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南方国家则更注重消除贫困 (SDG1)、零饥饿 (SDG2) 以及基础设施建设 (SDG9) 等指标。这种发展优先序的差异，导致南北方国家在资源分配和规则制定上难以达成共识。

第二，国家层面的内生能力与执行体系不足，其中南方国家的能力缺口尤为突出。2030 议程虽然是一项全球框架，但本质上需在国家层面得到落实。^[2] 很多国家将 2030 议程写进本国中长期规划与发展计划，但这并不意味着议程落实真正“在地化”。资源与决策权未实质下沉，也未能围绕本地问题形成可问责的权责结构。^[3] 从财政动员、统计监测，到在地化落实、跨部门统筹，多维度的能力缺口使相当一部分南方国家即便在文本上采纳与北方国家一样的目标与规则，也难以在进度和质量上与北方国家同步。

（三）地缘政治和外部环境的冲击

2030 议程是一个强调多边合作和伙伴关系的全球发展议程。然而，由于大国博弈加剧、新冠疫情冲击、地缘对抗升级以及部分国家内外政策的调整，发展议程的政治关注度、资源配置与制度空间近年来遭到不断挤压。

第一，大国博弈加剧，一些国家的“安全议程”冲淡了“发展议程”的主导地位。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报告，全球军费 2024 年增长 9.4%，

[1] Jeffrey D. Sachs et 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2025: Financ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2030 and Mid-Century.”

[2] Guillermo Santander Campos, “An Analysis of the 2030 Agenda from Political Theory: Opportunities as a Transformative Tool.”

[3] Gloria Novovic, “Can Agenda 2030 Bring about ‘Localization’? Policy Limitations of Agenda 2030 in the Broader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Vol.40, No.4, 2022.

是冷战结束以来最大年增幅，且是连续第10年增长。^[1]军费增加深刻影响了各国社会经济和政策制定，迫使各国政府在预算上作出取舍。英国、法国、德国等传统国际援助国下调对外援助与多边承诺，进一步恶化全球发展融资状况。世界粮食计划署披露，其2025年资金来源较2024年减少约40%，被迫削减或暂停28个关键行动地的粮食援助，导致近1670万人面临粮食援助被切断的风险。^[2]更具结构性的问题是西方在国际发展领域的政策逆转。英国在2020年将原本独立的国际发展部（DFID）并入外交、联邦和发展事务部，美国特朗普政府则在2025年正式关闭运行了近60年的国际开发署（USAID），曾经的发展援助大国在发展议程上的立场正不断倒退。此外，西方国家的一些民粹势力对多边援助和全球议程持怀疑和敌视态度，质疑2030议程的重要性，动摇了国际社会对多边发展的信心。^[3]2025年，美国明确宣布“拒绝并否认”2030议程，认为它与美国主权和国家利益不相容。^[4]

第二，地区冲突及区域性危机连锁冲击，压缩了2030议程的执行空间。2030议程刚出台时，全球多边主义氛围相对积极，但其后续推进受到多重外部因素的直接威胁。乌克兰危机等地区冲突占据了国际社会的政治注意力和财政资源，分散了对长期发展议程的投入；国家间信任下降导致气候融资、贸易、技术转让等关键领域的合作难以推进。公共卫生和教育系统严重中断，

[1]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2024,” April 2025, <https://www.sipri.org/publications/2025/sipri-fact-sheets/trends-world-military-expenditure-2024>.

[2] “UN’s WFP Says 58 Million Face Hunger Crisis after Huge Shortfall in Aid,” Reuters, March 28, 2025, <https://www.reuters.com/world/uns-wfp-says-58-million-face-hunger-crisis-after-huge-shortfall-aid-2025-03-28>.

[3] Andy Sumner and Stephan Klingebiel, “The EU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ree Options for a Post-2030 Framework,” in Christine Hackenesch, Niels Keijzer and Svea Koch, eds., *The European Union’s Global Role in a Changing World*, November 2024, <https://blogs.idos-research.de/2024/09/03/discussion-paper-11-2024-the-eu-and-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three-options-for-a-post-2030-framework/>.

[4] “Remarks at the UN Meeting Entitled 58th Plenary Meeting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United States Miss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March 4, 2025, <https://usun.usmission.gov/remarks-at-the-un-meeting-entitled-58th-plenary-meeting-of-the-general-assembly/>.

极端贫困和失业率回升，危及全球粮食安全，其中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尤甚，脆弱国家与冲突国家的发展议题在这一过程中被不断边缘化。MDGs 时期，发达国家把发展援助与全球反恐相关联，认为减少贫困、帮助脆弱国家发展能防止恐怖主义扩散，这为国际发展援助提供了相对统一的动力。但到 SDGs 时期，特别是 2015 年欧洲难民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将更多资源和注意力转向自身国内政治与移民治理，对外发展援助的政治意愿和资源投入受到削弱。

第三，应对全球性疫情和自然灾害耗费大量资源，挤占了其他方面的投入。新冠疫情是对 SDGs 的一次全面系统冲击，导致全球经济衰退，政府债务飙升，许多国家被迫将资源用于紧急救助，延缓或中止了长期发展项目；疫情还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教育、医疗卫生、性别平等方面的多项 SDGs 成果出现倒退。2024 年成为人类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创下海洋热浪强度、持续时间、范围的极值，^[1] 生态与渔业受到的冲击直接外溢至粮食、就业等关系民众生计的发展议题。在一系列自然灾害冲击下，全球新增流离失所人数创下近 16 年新高，对人道主义救助的需求随之剧增。^[2] 据统计，2024 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约 3680 亿美元，其中仅约四成有保险覆盖，^[3] 很多发展中经济体巨大的保障性资金缺口全靠财政兜底，占用减贫、教育、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公共支出，进而挤压 2030 议程的财政空间。

（四）全球发展治理和筹资架构的缺陷

从二战结束到冷战结束期间，美国在其半球霸权范围内实施垂直治理；在冷战结束后的近 30 年里，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力推垂直治理模式在全球范围的扩展和实施。但近年来，美国不断“毁约退群”，滥施单边措施，大肆攻击多边机制，并以“贸易再平衡”“国家安全”等理由破坏现有国际规则，

[1] Mercator Ocean, “Assessing the Ocean in 2024,” January 21, 2025, <https://www.mercator-ocean.eu/assessing-the-ocean-in-2024/>.

[2] WMO, “State of the Global Climate 2024,” March 19, 2025, <https://wmo.int/publication-series/state-of-global-climate-2024>.

[3] Aon, “2025 Climate and Catastrophe Insight,” <https://assets.aon.com/-/media/files/aon/reports/2025/2025-climate-catastrophe-insight.pdf>.

其内外政策走向对全球治理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尤其是其频繁退出国际协议、组建排他性联盟的行为，冲击了联合国在国际秩序中的核心地位与治理效能，给全球治理的前景带来巨大不确定性。其他西方国家也深陷经济增长乏力、不平等加剧等发展困境，以及民粹主义、政治极化、民主制度信任等内部危机。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其国际制度变革中的主体性也明显提高。在此背景下，原有的“霸权垂直治理”模式开始式微，新的多元权力扁平治理结构又尚未形成。换言之，旧有自上而下的制度架构并未及时转型，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与协调效能显著不足。^[1] 制度民主化与代表性改革滞后、发展筹资体系失衡，以及高成本与高不确定性的融资环境持续制约 2030 议程的推进。

第一，制度民主化程度有限，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偏低。2030 议程呼吁对全球治理体系所依赖的多边组织进行民主审查和改革，明确写入“确保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和金融机构决策过程中有更大的代表性和发言权”（SDG10.6）以及“扩大和加强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治理机构的参与”（SDG16.8）等内容，但近年来相关目标缺乏显著进展。以世界银行为例，美国、日本等少数国家拥有独立席位和较高投票权，美国甚至拥有对重大事项的实质否决权，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仅共享 3 个席位，总投票权不足 5.5%。^[2] 发展援助委员会（DAC）主要由包括欧盟及其大部分成员国、美国、日本在内的 33 个传统援助方组成，受援国却被排除在决策流程之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区域和跨区域层面的新机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代表性不足的问题，^[3] 但在推动全球性议程方面依然有明显局限。这种权力分配和决策参与的不平衡成为制约 2030 议程落实的结构性挑战。

[1] 秦亚青：《全球治理趋向扁平》，《国际问题研究》2021 年第 5 期，第 55-72 页。

[2]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Voting Power of Executive Directors,” July 1, 2025, <https://thedocs.worldbank.org/en/doc/1da86cb968275b94ab30b3d454882208-0330032021/original/IBRDEDSVotingTable.pdf>.

[3] 李佳：《国际组织十讲》，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5 年版，第 78 页。

第二，全球金融体系融资不足与治理掣肘，难以为 2030 议程提供相匹配、可负担的资金。2030 议程本身没有配套的资金或资金统筹协调机制，而现行全球金融架构在规模和结构上均难以满足 2030 议程落实的需要，低收入国家与脆弱经济体尤其受到融资问题的束缚。2015 年第三次发展筹资国际会议提出的《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既未能充分承认高收入国家的因果责任，也未能落实 2030 议程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1] 数据显示，全球每年的发展筹资缺口达 4.2 万亿美元，^[2] 发达国家和多边开发银行至今未兑现气候资金承诺，气候适应领域的资金缺口率高达 68%。^[3] 全球税、跨境反避税等超国家税制虽然被纳入创新融资，但迄今多为零散试点，没有形成稳定、可预期的跨国公共资金供给。^[4] 低收入国家由于债务负担的不可持续性，获得低成本融资的机会有限，无法对可持续发展进行充分投资。此外，全球公益事业融资也严重不足，资本持续流向高收入国家而非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5] 2025 年 7 月，第四次发展筹资国际会议通过《塞维利亚承诺》，围绕改革国际金融架构、扩大多边开发银行融资能力、改进债务处理、加强税收合作与国内资源动员、撬动私营部门、创新融资等作出一揽子安排，^[6] 但将这些政治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还需要跨越诸多障碍。^[7]

[1] 黄超：《2015 年后可持续发展筹资新框架及中国的应对》，《现代国际关系》2015 年第 10 期，第 7-15 页。

[2] 《联合国呼吁弥补发展筹资缺口，拯救可持续发展目标》，联合国网站，2024 年 4 月 9 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24/04/1127926>。

[3] U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Special Edition,” 2023, <https://unstats.un.org/sdgs/report/2023/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Report-2023.pdf>。

[4] Guillermo Santander-Campos,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2030 Agenda: An Unbalanced Relationship?”

[5] 《SDSN 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 2025〉：联合国通过可持续发展目标十年后，全世界仍高度致力于实现这些目标》，清华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网站，2025 年 6 月 24 日，<https://thusdg.tsinghua.edu.cn/info/1141/4095.htm>。

[6] “Outcome Document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July 2025, <https://financing.desa.un.org/sites/default/files/ffd4-documents/2025/Compromiso%20de%20Sevilla%20for%20action%2016%20June.pdf?>

[7] 《塞维利亚承诺：重建全球合作信任的关键一步》，联合国网站，2025 年 7 月 3 日，<https://news.un.org/zh/story/2025/07/1140241>。

三、围绕“后 2030 议程”的路径博弈

当前,随着 2030 议程进入末期,“后 2030 议程”的制定逐渐受到各方关注。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多边治理框架面临挑战、地缘政治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不同国家和国家集团就“后 2030 议程”的布局展开探讨、争论和博弈,呈现整体延续型、全球重构型、“区域多元型”的路径之争。

(一) 整体延续型路径: 延续或微调 2030 议程

整体延续型路径主张 2030 年后整体延续现有 SDGs 框架,也就是将 2030 议程顺延至 2040 年或 2050 年,并可能增补少量子目标以反映新出现的议题。这是欧洲发达经济体的基本主张。这种整体顺延方案试图保持全球议程的连续性和包容性,承认 SDGs 作为全球共识不能轻易推倒,并认为新的全球共识很难建立,强调政治可行性和稳定性。欧洲议会 2023 年发布的委托调研报告认为,SDGs 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语言”,很可能在“后 2030 议程”中延续,欧盟应在“后 2030 框架”中发挥领导性作用。^[1]德国发展与可持续性研究所(IDOS)也建议欧盟优先考虑沿用现行 SDGs 框架,延后 2030 议程的目标年限。事实上,欧盟的制度安排也体现了其明显的整体延续型倾向。《欧洲气候法》已将 2050 年实现碳中和、2030 年较 1990 年减排至少 55% 确立为目标,并于 2025 年启动法律修订程序,将 2040 年净减排 90% 的中期节点纳入目标。欧盟构建的净零路线图本质上体现了延续与深化既有目标体系的政策取向,推动净零目标与 2030 议程接轨。此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也释放出延续 2030 议程的明确信号,强调延续 SDGs “不让任何人掉队”和“首先惠及最落后的人”长期承诺的必要性。

总体而言,整体顺延型方案可降低全球议程在政治上的谈判风险和博弈

[1] Kalterina Shulla and Walter Leal Filho, “Achieving the UN Agenda 2030: Overall Actions for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Before and After the 2030 Deadline,” January 2023,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IDAN/2022/702576/EXPO_IDA\(2022\)702576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IDAN/2022/702576/EXPO_IDA(2022)702576_EN.pdf).

成本，避免各国就新的目标清单争执不下。但批评者指出，如果仅在形式上沿用 SDGs，而不触及 2030 议程框架本身的问题，等于将当前的进展不力简单归咎于地区冲突、新冠疫情等外因，回避了 SDGs 目标体系庞杂、资源摊薄、执行低效等内在症结，难以激发国际社会新的行动热情。^[1]

（二）全球重构型路径：重塑制度性改革与议程框架

全球重构型路径主张对 2030 议程的结构、治理和执行机制进行全面评估，推动较大幅度的、基于全球一体化的制度改革和框架重塑，为全球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主要经济体中，印度政策界和学界明确提出“后 2030 议程”需要新的制度范式，包括公平的多边主义、全球南方的领导力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整合，并认为印度可成为领导和创新的灯塔。^[2] 此外，发达经济体的学术界对重构“后 2030 议程”的态度整体比政界更加积极，也提出了若干主张。

第一，压缩目标数量，聚焦优先议题。也就是集中有限政治意愿和资源，解决最紧迫最普遍的问题，提升议程的针对性、可执行性、有效性和监测效率。剑桥大学学者设计了一个由 4 个维度和 7 项目标构成的“后 2030 框架”，包括环境与经济维度（在地球承载力内运作、在资源限制内增长）、实物资产维度（为所有人提供基本服务）、社会资产维度（消除贫困和饥饿、减少不平等、为所有人提供良好的公共卫生和教育）以及协作维度（建立强有力的机构和国际伙伴关系）。^[3] 德国发展与可持续性研究所虽然更支持整体延续型路径，但也提出一种可能，即在当前多重危机与压力源叠加的背景下，构建一个契合广义人类安全理念的新框架，通过降低风险来源和强化社会保障，确保国家和民众消除贫困或不返贫。^[4] 《自然·可持续发展》（Nature

[1] Andy Sumner and Stephan Klingebiel, “The EU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ree Options for a Post-2030 Framework.”

[2] Reliance Foundation and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The Next Frontier: Charting the Contours of the Post-2030 Development Agenda,” 2024, <https://www.orfonline.org/research/the-next-frontier-charting-the-contours-of-the-post-2030-development-agenda>.

[3] Tom Cernev and Richard Fenner, “Beyond 2030: Structures for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ontiers in Climate*, Vol.6, 2024.

[4] Andy Sumner and Stephan Klingebiel, “The EU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ree Options for a Post-2030 Framework.”

Sustainability) 期刊社论主张建立一个以消除贫困、减少不平等及其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为核心的“后 2030 框架”，认为这一路径相较于体系复杂的 2030 议程，在政治上更能凝聚共识，形成稳定的多边合作基础。^[1]

第二，充分考虑目标之间的系统性互动。2030 议程的核心挑战不是设定目标，而是实现政策整合，围绕目标和指标、实施行动、政策工具、机构安排等界定整合对象，在多层级治理中设计协作运行机制。应把资源分配等有争议的议题纳入执行框架，让指标成为沟通与建立政治互信的工具，而非单纯的技术量表，^[2] 通过透明、可沟通的方式创造不同国家在责任、利益、公共性等关键议题上审议与协商的空间，在指标和数据基础上加强对话与合作。应为方向性目标设立清晰的指标、阈值与期限，区分用于设定硬性约束和强问责机制的“状态类”目标和强调改进方向的“趋势类”目标及其评估方式，^[3] 提高跨国可比性与可执行性；“趋势类”目标可比性弱，但更具灵活性和兼容性，有利于不同国家的能力对接。应以空间性（国家—地方—社区多层级齐平）、多样性（避免所有国家采用同一模式，避免将市场与技术作为唯一路径）、历史性（强调历史责任与损失补偿）为支点，重塑全球议程的价值和结构。^[4] 良好的治理和制度效能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SDGs 的长期进展有赖于国家提升治理能力和降低风险，治理与风险的维度应被纳入 SDGs 目标体系与评估框架。^[5] 此外，应将现行分散目标浓缩为一组由科学支撑、可量化的关键指标，设定 2030 初始目标与 2050 长期锚点，作为各部门政策与模型评估的共同标尺，克服指标分散与口径不一带来的比较与协调难题。^[6]

[1] “Editorial: A Post-2030 Vision,” *Nature Sustainability*, Vol.8, 2025, pp.849-850.

[2] Guillermo Santander Campos, “An Analysis of the 2030 Agenda from Political Theory: Opportunities as a Transformative Tool.”

[3] Jyri Mustajoki et al., “Ambitiousnes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SDG) Targets: Classification and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Making,” *Discover Sustainability*, Vol.3, No.36, 2022.

[4] Ankut Kumar et al., “Development Beyond 2030: More Collaboration, Less Competition?”

[5] Edward B. Barbier and Joanne C. Burgess, “Institutional Quality, Governance and Progress towards the SDGs,” *Sustainability*, Vol.13, No.21, 2021.

[6] Van Vuuren et al., “Defining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arget Space for 2030 and 2050,” *One Earth*, Vol.5, No.2, 2022, pp.142-156.

第三，统筹评估和问责机制。在评估模式上，把对指标完成情况的单纯监测拓展为对议程实施行动的全面评估，将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预算投入与目标进展纳入同一评估闭环。^[1] 在评估机构上，改革现有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和自愿国别评估，加强问责，赋予地方行为体本土实施的权力。^[2] 在评估周期上，对未达标领域进行定期风险评估并采取纠偏行动，提高政治领导人对未实现目标可能风险的警觉。^[3] 此外，融资和合作机制创新、新兴技术应用、相关风险防控^[4] 等方面的问题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对大多数南方国家而言，鉴于现行 2030 议程在融资、执行和问责上的缺陷，“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的全球治理框架需要更多体现历史责任分担与制度公平，致力于克服 2030 议程的内生性问题。基于 2030 议程进行部分延续和聚焦重构的路径，不失为一种积极有效的方案。然而，推进新议程谈判的难度不可小觑。有学者认为，欧盟、美国，以及中国等新兴大国，乃至更广泛的全球南方国家，均以各自的利益关切、叙事框架和发展范式积极介入“后 2030 议程”的设定。^[5] 这种多元博弈导致“后 2030 议程”在理念主导权和制度安排上面临更多竞争，主导方、话语体系与国际规则都有可能发生深刻变化。

（三）“区域多元型”路径：全球议程碎片化与区域议程兴起

所谓“区域多元型”路径，主张“后 2030 议程”不再追求统一的全球框架，声称给各区域依据自身情况制定可持续发展议程留下更大空间。这是当前美

[1] Mark Elder and Susanne Grünewald, “Insights from Agenda 21 for Enhanc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DGs and Shaping the Post-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

[2] “Reporting from the Workshop: What Is the Future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o and Beyond 2030?,” 2023, <https://www.earthsystemgovernance.org/news/what-is-the-future-of-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to-and-beyond-2030/>.

[3] Tom Cernev and Richard Fenner, “Beyond 2030: Structures for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4] Wasswa Shafik, “The Future of Technology and the SDGs: Pathways to 2030 and Beyond,” in Wasswa Shafik, *Factoring Technology in Global Sustainability*, Berlin: Springer, 2025, pp.497-525.

[5] Andy Sumner and Stephan Klingebiel, “The EU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ree Options for a Post-2030 Framework.”

国政府的明确主张。这意味着国际社会在 2030 年后无法形成新共识，全球发展议程将被迫进入碎片化阶段，^[1] 全球层面只保留松散的共同目标指导，区域联盟和次区域组织需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美国的立场成为助推全球议程碎片化的重要因素。特朗普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后不久，美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声称，2030 议程是一种“软性全球治理”，与美国主权相悖，侵蚀了美国人的权利和利益，“世界主义努力已在选举中失利”。^[2] 这一表态深刻反映了共和党保守派对全球发展议程的长期怀疑和抵制，也反映了美国选民的心态和选择偏好。在“后 2030 时代”，美国很可能拒绝全球议程。显然，“区域多元型”路径将在制度上加速全球议程的碎片化，进一步削弱多边体系的整体行动力，甚至意味着联合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严重衰退和失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严重倒退，对全球发展带来釜底抽薪式的负面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现有区域议程的存在并不等同于“后 2030 议程”的“区域多元型”路径。当前，包括欧盟、非盟、东盟在内的许多区域组织均制定了自身发展议程。非盟于 2013 年发起《2063 年议程》，并通过“十年计划”机制形成中长期发展蓝图；欧盟与东盟也分别构建了较为成熟的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与合作框架。但是，这些区域议程通常是作为全球议程的补充和落地机制，起到为全球议程提供试点经验、驱动制度创新、促进伙伴关系的作用，是全球治理的中间层级，而非取代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议程。无论是支持延续型路径的欧盟，还是支持重构型路径的国家，总体上仍支持一个统一的全球性议程。然而，如果全球层面无法形成新的统一议程，体现全球共识的制度安排缺失，这些区域议程就可能在缺乏协调的情况下被动转化为全球议程的替代性力量，加剧全球治理碎片化，削弱国际合作整体性，导致全球发展

[1] Andy Sumner and Stephan Klingebiel, “The EU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ree Options for a Post-2030 Framework.”

[2] Mark Segal, “U.S. Rejects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March 7, 2025, <https://www.esgtoday.com/u-s-rejects-un-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进一步停滞，发展鸿沟进一步扩大。换言之，现有区域议程是全球议程框架下的补充力量，重点是推动区域议程和全球议程更好地对接和协同；而“区域多元型”路径意味着替代现有全球性议程，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四、中国落实 2030 议程的贡献与未来路径选择

过去十年，中国主动承担大国责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制定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成为 2030 议程的重大贡献者。引领“后 2030 议程”的发展路径，无论对中国自身发展还是全球发展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如前所述，全球重构型路径强调对现有议程进行制度性改革与框架重塑，回应融资不足、执行力欠缺、问责机制偏软等内生性问题，不仅有助于聚焦目标，集中资源，提升全球议程的务实性和执行力，还能为中国提供引领议程的角色空间。通过持续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前瞻性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中国有条件以更加聚焦的核心目标、更可执行的指标体系，凝聚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兼顾北方国家的合理关切，加强现有区域议程和“后 2030 议程”的对接，积极倡导全球重构型路径，从而塑造“后 2030 时代”全球发展和全球治理的新格局。

（一）中国是 2030 议程的重大贡献者

中国作为 2030 议程的坚定支持者和践行者，以系统性举措将全球目标深度融入国家发展主线，不仅促进了自身高质量发展，也通过知识分享与能力建设为全球南方国家推进 2030 议程提供助力。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为落实 2030 年议程贡献的中国智慧和方案。^[1]2024 年，习近平主席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成立 60 周年庆祝活动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指出，中国将助力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愿同各方一道，以

[1] 《协同推进“一带一路”和 2030 年议程，共谋全球可持续发展——张军大使在〈“一带一路”支持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发布会上的主旨讲话》，外交部网站，2022 年 9 月 14 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l_674979/dnzt_674981/qtzt/ydyl_675049/zwbd_675055/202209/t20220915_10766229.shtml。

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美好未来。^[1]

在国家层面，中国将落实 2030 议程全面融入国家发展规划和战略目标，同“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等中长期发展战略有机结合，通过跨部门协调机制推动 SDGs，取得重大进展和显著成效：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开启乡村振兴新征程；经济实力明显提升，经济发展展现强大韧性；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进展。^[2]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数从 2016 年的 59.1 分上升到 2025 年的 74.4 分，排名从第 76 位上升到第 49 位。^[3] 在此期间，中国发布 4 份落实 2030 议程进展报告，两次参加落实 2030 议程国别自愿陈述。

在国际层面，中国通过资金、项目、倡议、知识分享等多种途径，为区域和全球推进落实 2030 议程提供公共产品。一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形成 3000 多个合作项目，为沿线国家创造 42 万个工作岗位，使近 4000 万人摆脱贫困；^[4] 许多“小而美”对外援助民生项目落地。二是通过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务实合作，有效凝聚国际发展共识，动员国际发展资源，共同解决全球发展赤字；依托南南合作等机制，积极探索不同于传统援助的发展合作路径。中国于 2018 年成立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CIDCA），整合商务部对外援助工作有关职能及外交部对外援助协调等职责；

[1] 《习近平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成立 60 周年庆祝活动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外交部网站，2024 年 6 月 12 日，https://www.mfa.gov.cn/zyxw/202406/t20240612_11435029.shtml。

[2]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3）》，2023 年 9 月，https://www.mfa.gov.cn/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2030kcxzfzyc_686343/zw/202310/P020231018366004072326.pdf。

[3] Jeffrey D. Sachs et 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2025: Financ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2030 and Mid-Century”; Jeffrey Sachs et al., “SDG Index and Dashboards – A Global Report,” July 2016, https://s3.amazonaws.com/sustainabledevelopment.report/2016/2016_sdg_index_and_dashboards_report.pdf。

[4] 《特稿：长风万里启新程——全球瞩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开启新阶段》，中国政府网，2023 年 10 月 21 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0/content_6910812.htm。

于 2022 年发起“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设立开放式项目库，在重点领域推动合作。三是加强技术合作和知识分享，成立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等机构，发起全球发展知识网络，加强知识分享和能力建设；共享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 1 号数据产品，定期发布《全球发展报告》《地球大数据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报告》等知识产品。^[1]

（二）积极推动“后 2030 议程”重构

欧美国家由于经济发展停滞、孤立主义回潮、民粹主义兴起，对全球发展合作的支持已大不如前。OECD 报告指出，DAC 成员的官方发展援助（ODA）总额在 2024 年下降 9%，预计在 2025 年将再下降 9% 到 17%，之后的前景高度不确定。^[2] 中国基于自身成功经验形成的发展范式在全球南方表现出较强吸引力，有必要也有能力推动一个统一且有效的全球议程。

第一，积极把握联合国未来峰会等制度进程的契机，推动全球发展议题与未来治理改革有机结合，在塑造“后 2030 议程”中展现主动性。为此，必须在各类国际场合进行前瞻布局，为“后 2030 议程”预留充分的制度衔接与政策延展空间，将发展议程锚定于国际合作的中心，确保发展议题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在新一轮全球议程中贡献中国方案。这也完全契合《中国出席联合国未来峰会和第 79 届联合国大会立场文件》阐述的核心原则：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3]

第二，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依托自身全球发展实践，在坚持务实行动的同时彰显道义高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联合国《我们的共同议程》、人类安全等理念高度契合，具有价值共通之处。一方面，中国应推动全球发

[1]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2023）》。

[2] OECD, “Cuts in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ECD Projections for 2025 and the Near Term,” June 26, 2025, https://www.oecd.org/en/publications/2025/06/cuts-in-official-development-assistance_e161f0c5/full-report.html.

[3] 《中国出席联合国未来峰会和第 79 届联合国大会立场文件》，外交部网站，2024 年 9 月 19 日，https://www.mfa.gov.cn/web/ziliao_674904/zcwj_674915/202409/t20240919_11492977.shtml。

展和治理的公平正义，将全球性、紧迫性、基础性议题置于优先位置，不仅要主动回应减贫、气候变化、数字鸿沟等全球性紧迫挑战，更要在议程设置中优先关注广大南方国家的核心关切，凝聚“全球南方”共识。同时，以建设性姿态沟通和对接主要大国与不同区域议程的关切。另一方面，中国应以促进全球共同发展和人类和平繁荣为主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需求与参与全球治理的实际行动有机结合，将国内高质量发展所积累的技术、生产能力、治理经验转化为惠及更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有效公共产品。

第三，以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载体，提供务实的国际发展和治理合作平台。全球发展倡议是中国对全球发展议题的深刻洞察和积极贡献，倡导围绕减贫、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八大重点领域开展合作，是推动 2030 议程的中国方案，为“后 2030 议程”提供了宝贵借鉴和蓝本。同时，中国新发展理念所强调的创新驱动、环境友好、普惠共享等原则回应了全球发展的共同关切，为“后 2030 议程”的制度设计贡献了中国智慧。全球发展倡议很大程度上能够成为“后 2030 议程”的重要参考范式。全球治理倡议所倡导的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行动导向五大原则，聚焦当前全球治理权力不对称、法治无效力、合作不稳定、信任缺失、履约不力等问题，为国际社会提供重建合作关系的信心和信任，有望为“后 2030 议程”的制度设计争取更多代表性和公平性，奠定坚实的原则基础和治理框架。

（三）针对 2030 议程内生问题聚焦重点内容

第一，凝练目标、突出重点，形成务实框架。“后 2030 议程”的设计应聚焦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中国可以自身在减贫、数智化转型、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优势为支点，推动这三项目标成为“后 2030 议程”的优先任务。同时，中国应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凝聚脆弱国家和冲突国家的共同诉求，要求在融资、技术转让、历史责任方面实现制度公平，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和各国发展治理自主化，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此外，应妥善回应欧盟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关切，如气候行动与绿色合作、经贸再平衡问题，在深化南南合作的同时推进南北合作，寻求交集和最大公约数，争取后 2030 全球性议程的达成。

第二，推动强有力的问责和报告机制，加强资源支持体系。一是在全球、区域、国别三个层面加强后续评估，把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实施手段的落实纳入重点审议范畴。二是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力度，敦促发达国家兑现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出资承诺；创新融资渠道，构建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融资体系；推动全球金融架构改革，加快落实实质性债务减免方案，减轻脆弱国家的债务负担；提升多边开发银行的资本金和风险承担能力，帮助发展中国家以可承受的成本获取必要的发展资金。三是促进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建立合理激励机制，引导资本流向符合“后 2030 议程”目标的重点领域。四是维护 2030 议程在数据统计和监测上所取得的成果并进一步完善，推动基于数据的问责机制和强制报告机制，确保“后 2030 议程”的务实性和有效性；推动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升数据采集、上报和共享的能力，鼓励利用大数据、遥感、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提高数据质量和可操作性。

第三，在融资体系改革领域提升南方国家的代表性与能力。发展融资是全球发展的命脉，为“后 2030 议程”提供资金与融资条件是重中之重。在联合国第四次发展筹资国际会议上，中方呼吁发达国家足额履行官方发展援助承诺和气候资金义务，广泛动员各类发展资源，拓宽协同有序的发展筹资渠道；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架构中的话语权，推广本币融资工具，筑牢全球金融安全网，完善高效稳健的发展筹资体系，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减少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的负面外溢效应，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融资环境；^[1] 与 77 国集团宣布共同推动《塞维利亚承诺》。在 2025

[1] 《习近平主席特使、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出席联合国第四次发展筹资国际会议》，财政部网站，2025 年 7 月 2 日，https://gjs.mof.gov.cn/gongzuodongtai2019/gongzuodongtai/202507/t20250702_3967035.htm。

年 9 月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上，中国明确尽快建成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这些承诺和行动，不仅是对现有融资体系缺陷的直接回应，更是为“后 2030 议程”探索可行方案的关键实践，旨在通过具体的南南合作，推动全球发展融资体系向更具包容性与实效性的方向演进。

五、结语

2025 年是联合国成立 80 周年，也是 2030 议程提出十周年的关键节点。过去十年，2030 议程在公共卫生、教育、能源获取、数字联通等领域取得积极进展，但在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全球议程面临系统性迟滞。围绕“后 2030 议程”的制度走向和整体延续型、全球重构型、“区域多元型”三种路径的博弈或争论，关系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和分配格局的再配置，是人类未来发展议程的再设计。“后 2030 议程”的未来走向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中国面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刻变革和地缘政治挑战，在落实 2030 议程和践行全球发展倡议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资源，能够在维护 2030 议程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塑造和引领全球重构型路径，为“后 2030 议程”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价值指引，以全球发展倡议为合作蓝本，以全球治理倡议落实为契机，围绕理念引领、路径选择与执行机制，推动形成目标更聚焦、行动更务实、问责更有效的后 2030 制度安排。这不仅是对 2030 议程既有经验的回应，更是在新形势下对未来全球发展和治理格局合理有效的塑造。

【责任编辑：吴劭杰】